



高鸣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 快报记者 张荣 摄

钱学森的去逝,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——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2005年,钱学森就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可惜,在他走的时候,仍旧没有人给出掷地有声的答案,因为,要颠覆几十年来的教育传统,实在需要太多勇气。

其实,在钱学森发问之前,早就有人开始勇敢地挑战传统。比如,北京的童话大王郑渊洁,他让儿子辍学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。郑渊洁的做法,被称为是“危险的实验”。无独有偶,几乎就在郑渊洁决定让儿子辍学的同时,南京有个家长也进行了一个“危险的实验”。这个家长叫高鸣,他的“实验品”是女儿高韵冽。十多年过去了,他的实验结果怎样呢?

# 他用女儿的实验 回答钱学森之问

## “我庆幸自己没能上大学”

高鸣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,他的童年与文革不期而遇。时代的命运让高鸣没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,但是和时下的孩子们比较起来,高鸣却觉得格外庆幸。

“我上一年级,赶上文革。学校不上课,学生们‘放羊’。我就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书摊上去看书,精彩的小人书,古典名著,都是在那个时候接触的。”小书摊给了高鸣充足的养分,“没有大人和老师逼迫,我反而读了更多有用的书,很小能写漂亮的文章,20岁就被选中给后来的省委副书记当秘书。”

说起自己的乏善可陈的教育经历,高鸣没有流露出丝毫遗憾,“常常有人说羡慕现在的孩子,可是我一点也不。现在的教育制度有问题,孩子们是为了分数而奋斗的机器,家长也变成了学校的帮凶。比如,就在昨天,一个朋友还在向我诉苦。老师要求他的孩子补数理化,其实孩子文科很棒。可是老师担心孩子会拖班级的后腿,也担心孩子在高考中被刷掉。于是,家长花钱,孩子受罪。”

当“钱学森之问”还没有提出来时,高鸣就开始关注教育的话题了,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,这是钱老的问题,也是时代的问题。回想大师辈出的民国年代,那时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今天多么不一样。”

多年前,高鸣曾有幸聆听了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的一番话,“徐铸成1927年进入北师大读书,曾选过钱玄同先生的课。钱玄同上课很奇怪,他从不看学生有无缺席,只用笔在点名簿上一划到底,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。他也从来不考试,学期末就按照点名册的先后,给学生打分,60分、61分……一直打到100分,如果还有人,就从60分再来一轮。”

特立独行的钱玄同,之前曾在北大任教,他的学生中就有朱自清,“朱自清爱写散文,那就让他写散文。徐铸成爱写新闻,他就写新闻。后来,朱自清成了散文大家,徐铸成则成了《文汇报》的社长兼总编辑。”

在高鸣看来,正是老师这种看似随心所欲的教法,给了学生最大的发挥空间。“如果朱自清和钱玄同的老师,硬要他们为了分数去努力,也许中国现代史上就缺了一位散文大家,少了一朵新闻奇葩。”

## 他告诉女儿“不要100分”

个人的经历和前代大师的经历,促使高鸣思考。特别是女儿高韵冽降生后,怎么教育下一代的问题,真真切切地摆到了高鸣面前。

“我老早就下定决心,绝对不强迫女儿和时下恶俗的教育体制合拍。她很小的时候,我就在观察,女儿到底喜欢什么。我要让她按照天性发展,要培养她的性格和能力,而不是分数。”

女儿高韵冽上幼儿园时,到了星期六,常常跟着当时做记者的爸爸出去采访。一方面,她一个人在家里没人带,另一方面,高鸣希望女儿多接触社会。女儿跟着高鸣,从小就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,产生了关注人的兴趣,“走在马路上,她能看出‘这个人像老师’,‘那个人像老板’……有一次采访回家后,女儿看我在写新闻稿,就拿起一支铅笔,跟我要了一张方格纸,一本正经地写了起来。”

小家伙会写什么呢?高鸣写好稿子后,瞟了一眼女儿的劳动成果——一张纸的三百个空格里画了300个圈。“女儿的‘处女作’,本身并没有价值,但是她有兴趣写,倒是很宝贵的。我表扬她,并趁机告诉她,写文章并不难,等长大识字了,就能写出好东西。”

女儿上小学了,高鸣把女儿送到校门口,叮嘱了一句:“不要100分。”“我告诉女儿,如果她考了100分,只能说明两点。第一,学习动机不良,肯定是为考试而学习;第二,学习方法不好,肯定是死记硬背。作为一个学生,这个世界上需要学的东西很多,老师教授的

知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,不值得花十分的力气去掌握,更不值得为了100分而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”

除了“不要100分”,离经叛道的高鸣还给女儿定了几条更离谱的规定。一是回家不许读学校的书,做学校的作业;二是每天要读半个小时课外书;三是考试前不许复习;四是每星期旷课一天,在家自学。

高鸣的一意孤行,让周围的不少人都替高韵冽捏着一把汗。谁知道,女儿小学毕业时,高鸣做出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。

## 有人批评他:“你把女儿当实验品了”

女儿小学毕业,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一所公办中学。“这是重点学校,升学率全市第一,当年招了400个人。去了399个人,唯独我女儿没去。”

女儿之所以没去,和爸爸高鸣到该校的一次经历有关,“我有事去学校找校长。进了校园,我向学生问路,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冷漠。我还听说,在这个学校,如果成绩好的学生生病了,他的同学会高兴,因为他落了功课。”

高鸣决定把女儿送到一所民办中学,“那时候,这个学校刚刚建立,提出了素质教育的观念。我觉得很好,就把女儿送了过去。当时,这个学校招收的都是一些成绩不够好的学生。为此,我的一位朋友尖锐地批评我,他认为,我在拿女儿当实验品,在走一条危险的路。他们认为我走的路有风险,实际上千军万马的学生为分数努力,这才是有风险的。不过,因为有太多人陪伴着,大家就意识不到风险了。”在高鸣看来,盲目追求分数,不仅是有风险的,而且是愚蠢的。

民办学校的升学率虽然不如重点中学,但高鸣觉得很好,“我到学校去找我女儿,学生一听,热情地对我说,‘叔叔,韵冽在洗衣服。’”在高鸣看来,学生的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情商,“对于一个人来说,情商比智商更重要。成功更需要的是情商,不是智商。”

三年后,女儿初中毕业,她独立能干,处理问题远比同龄人成熟,更让别人吃惊的是,她的成绩也非常好,“我女儿从小学到初中,成绩始终保持年级第一。初中期间,还因连续11次考试成绩第一,获得奖学金5万元。”见女儿轻轻松松搞定学业,高鸣就鼓励上初中的女儿抽空学习高中的知识。“结果,她在初中毕业的同时,拿到了高中文凭。”

就在大家琢磨,接下来另类的高鸣会怎样帮女儿规划人生时,父女俩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:哪也不去,啥也不干,就在家歇着。

当然也不是真的呆在家里不动弹,利用一年的时间,高韵冽泡新华书店、泡图书馆,跟着爸爸采访。社会的大门提前向这个15岁的女孩敞开了。

一年后,高韵冽到新西兰留学,小女孩把

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而且,利用课余时间,她开始炒外汇,“随着纽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的浮动,女儿选择买进或者卖出,赚了不多少钱。而且因为她从小就会烧菜,恰好她的房东喜欢中国菜,大家互惠。房东有了美味佳肴,女儿的房租便宜了一半。”

女儿的这些本领,高鸣说,全都得益于一个没有玩具的童年。

## “家长请把孩子的玩具拿开”

在高鸣的有意引导下,女儿三岁学会打电话查天气预报,6岁开始帮爸爸订机票,7岁开始独立烧早饭,12岁就跟着爸爸去证券交易所炒股……高家小女的童年和别人不一样,甚至没有一件玩具。

“别人都觉得我不可思议。我倒觉得别人更不可思议,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,最终是要长大的。不是让父母捧在手心里当玩具的,不是为了玩玩而玩来的。”前不久,在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,高鸣抛出了自己的这个主张,没想到引来一片哗然。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晓虹教授坚决反对我,周教授说,玩具并不坏,比如,他小时候玩玩具,就锻炼了方向感。”

高鸣坦白地承认:“的确,我的方向感很差,看了电影,出门就迷路。开个汽车,不会开空调。用手机发短信,只要手机一换,我就发不来。不过,我当时就反问周教授,你知道我不玩玩具的时候在干什么吗?我在听美国之音,我那时候就知道民主、专政,知道市场经济,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,我们这个国家就少走很多弯路了。”

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如果用十分的聪明去做十件事,不如用五分的聪明去做一件事;当别人都在盲从时,你应该另辟蹊径、主动出击,才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这就是高鸣的思维模式。如今,大学毕业独立创业的女儿,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思维方式。而且,她比父亲做得更好。

“女儿招聘了一个文秘,文字功底不好。我建议女儿把她辞退。女儿说,不,她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。后来那个文秘就去做了销售,现在已经是业务骨干了。”赚了钱的高韵冽,还以自己的名字在南京大学设置了一项奖学金。在爸爸高鸣眼里,女儿完全有资格当选杰出青年。

养育了一个成功的女儿,成为高鸣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,就像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评价他的那样,“陶行知说,人生为了一件大事而来。你来了,做了两件大事。教育好了女儿,并且成了所有父亲应该学习的榜样。”

而高鸣现在的心愿则是,“想把我教育女儿的方法推广,希望我的这个实验,能够成为一个模本。我们需要独立自主、成熟、有个性的下一代。”

## 声音

### 沈俊(高韵冽中学时代的校长): 高家的家庭教育 是可以作为楷模的

我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,做校长八年,教过的学生可谓多矣。很多学生和我已经相忘于江湖,但是高先生的女儿我却记忆深刻。因为她的优秀和自信让她本来较好的形象更加有了神采。作为学校学生会的主席,她以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。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高先生夫妇是成功的。作为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: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,高家的家庭教育无疑也是可以作为楷模的。

### 南师大教育专家: 高鸣育女法不可复制

高鸣教育女儿的出发点是好的,方法也是可取的。他有一套完整的、科学的规划,因此,在实施的过程中,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。另外,他注重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做法,值得每个家长学习。但是,有一点大家且不可忘记,高鸣和他的妻子提供给女儿的经济条件很不错,在我们的这个社会,他们至少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。因此,上得起私立学校,经济条件也许可送孩子到国外留学,即使孩子没有文凭,也可以创业。正因为有这样的“底气”,他们敢让孩子离开重点中学敢让孩子辍学。一般的工薪阶层,我想,他们只能选择学校教育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高鸣教育女儿的模式是无法复制的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,有个叫周建湘的老师,曾经写过一本书,叫《我只养你18岁》。他在儿子上初一时,把儿子领回了家。儿子18岁时,他要求儿子独立。后来,他的儿子离开家,就再也没有回来,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。让孩子独立,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周建湘咬着牙坚持过来了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其实失败了。

### 郑渊洁: 我从未曾打算让女儿辍学



郑渊洁和女儿郑亚飞 资料图片

我让亚旗中途辍学,并不代表我反对现行的教育制度。相反,在对女儿亚飞的教育过程中,我从未有过也让她辍学回家的打算——亚飞和她哥哥截然相反,对考试有种狂热,只要一谈考考她,马上会扔下最精彩的卡通飞奔过来,考完后的一句表扬可以让她乐滋滋高兴好久——她是那种可以在考试中获得乐趣的孩子,所以,我会让她一直读下去,按照她自己的说法,要读到博士。

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,关键在于做父母的是否善于发现——合格的教师和父母,发现孩子的优点,告诉他什么地方行;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,发现孩子的缺点,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。这就是我的心德。

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



高鸣和女儿高韵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